

1929-1939年

世界经济萧条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 022 8470 4

1929—1939年世界经济加两本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 著

宋承先 洪文达 译

上海译文出版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译出

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 著

宋承先 洪文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青浦任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38,000

1986 年 7 月第 1 版 198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 4188·53 定价: 1.90元

译者的话

《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对本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作了历史的论述和理论的分析。作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10年生于纽约，193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战前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任职，大战期间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等处工作，战后担任过马歇尔欧洲复兴计划顾问、国务院伍德奥经济事务组主任、总统国际货币储备顾问委员会成员等职务。1948年起，他一直在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任教，1965—1966年是该校教授委员会主席。金德尔伯格一般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属于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他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有较广泛的研究，对于国际金融的研究在西方经济学界有一定声誉。他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1977年已发行第三版)一书，对于战后兴起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亦称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流派(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观点到七十年代的新发展)，都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评论。他的主要代表作则是《国际经济学》(1978年已发行第六版)。

本书以资本主义世界空前深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为中心，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39年期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概况，大体上按照年代顺序作了简要叙述，同时每

GDC 92/11

一章又以某一年或几年中的一个或几个重要问题为中心，运用历史材料，进行论述。作者特别强调国际金融对于各国经济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我在自己所专攻的国际金融机制这一领域中，找到了关于萧条为什么如此广泛、深刻和持久的答案。”因此，几乎在全书的每一章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国际货币金融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作为一本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经济周期史的专著，本书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制度的演变，即从战前普遍实行的金本位制逐渐演变为金汇兑本位制，到三十年代各国终于先后被迫放弃金本位而采用不兑现纸币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系统的历史材料。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在都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活动是紧密相关的。英、美、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它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出于各自的利害得失，既勾心斗角，互相争夺，又不得不谋求“合作”，共商对策。作者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的时候，也对有关国际金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这些历史的叙述和理论分析，不仅有助于加深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而且对于理解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七十年代以来出现的重大变化，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也提供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但本书与其说是以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为中心的经济周期史的专著，毋宁说是结合具体历史事实，根据作者的观点，广泛地介绍和评论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经济周期理论的著作。我们知道，对于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

总的特点以及其中一些重要事件，资产阶级各个流派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乃至一些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在他们的专著或论文中，曾经发表过大量的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把本书涉及到的各种各样有关经济周期的理论观点，概括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纯货币经济周期论，即把危机爆发以及危机前后出现的累积性扩张和紧缩的原因，单纯归结为货币流通量的变化；另一类则强调非货币的（亦称实际的或实物的）因素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又可分为投资与消费两个方面，由此有所谓投资过多（即生产资料生产过剩）的危机理论，或投资不足（即对生产资料或称资本财货的需求不足）的危机理论，以及消费不足（即消费品需求不足）的危机理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消费支出或投资支出的减缩，或者用金本位条件下银行信贷的紧缩或纸币本位条件下政府采取紧缩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来解释生产水平的下降和危机的爆发，这种似乎言之成理的说法，无非是描述了一种不言而喻的表面现象：即生产之所以下降是由于对产品的需求减少了。问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危机理论在进一步说明消费、投资以及货币流通量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的时候，一般是把它们归结为一些自然的、技术的或心理的原因，这就不但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科学分析，而且掩盖和歪曲了危机的真正根源。这就足以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危机的种种解释，都是非科学的。本书作者无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空前加剧的必然表现，也属如此。但作者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关经济变量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的机制的理论分析，以及有关各国的政策措施对经济危机具体进程所起作用的论述，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情况。为了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和国际经济中采取的干预调节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分配的种种政策措施对战后经济周期的进程所起作用，本书提供的某些材料，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序言，第一至第八章由宋承先翻译，第九至第十四章由洪文达翻译。限于水平，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不吝指正。

序 言

“我正是从这儿进入的。”当沃尔弗勒姆·费希尔博士要我写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史写点东西的时候，我欣然照办了。我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世界性的萧条有着强烈的研究兴趣，这种兴趣在一些学者当中是到处可见的。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我自己想把我青年时代和学术生涯初期所发生的那些复杂事件写出来，正是这些事件把我和其他许多人引入了经济学这一领域。

1929年10月证券市场的崩溃，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对世界其余部分的冲击我虽意识到了，但对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无所谓的。家里的少量证券仍然全部属于我们所有，而不仅限于垫头。尽管经济衰退，由于在航运界的叔父帮忙，第二年夏天我在一艘货船上找到了工作，这艘货船把重型设备从哥本哈根运到列宁格勒，再从芬兰的科特卡、劳莫和凯米运回木纸浆。我没有把它看作通常的倾销过剩货物，我不懂那一套。它不是本书第八章论及的1932年以后发生的那种汇兑倾销。它之所以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主要是因为这么一件事：每当货船到达哥本哈根后，人们可以用工资去喝啤酒和烈性酒（我作为船上的服务员，每月工资二十美元）。这段航海生涯培养了我对国际贸易的兴趣和对图博尔啤酒的嗜好，这

在我一生中都保持了下来。(我有一个朋友于1940年通过他的叔父在船上找到了一个工作。帮助我找到工作的叔父是一家航运公司的副经理，而他的叔父则是海员工会的副主席。裙带关系在整个三十年代一直存在，不过具体情况已有些改变。)

家庭收入虽然日益减少，但还足以支付我在大学学习的费用，以及1931年夏天利用暑期奖学金到欧洲参加国际学生联盟举办的研究班的旅费。这个研究班本来是由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主持的，由于他恰好被任命为西班牙驻美大使，所以我们这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大学生，就被送往艾尔弗雷德·齐默恩教授(后来成为爵士)主持的日内瓦国际研究所，同该所原有的学员一道学习。从客座讲师的讲座到暑假结束时送别帕特里克·斯隆(他随身带着大量卫生纸和缝纫针前往苏联度假一年)的欢送会，都是令人兴奋的经历。

然而，我不能说我对于第七章描述的那些事件形成了十分清楚的概念。我曾无意中发现，我在那个夏天使用过的笔记本上，记录了来自美国的保罗·道格拉斯和E·M·佩特森，以及莫里斯·邦恩，亨利·豪泽，道格拉斯·科普兰和其他许多人的讲演。笔记本上还有一份我在经济学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提纲，题目是“美国的经济情况”。这些粗糙的东西后来对我并没有什么帮助。我之所以注意到国际清算银行，主要是因为那家银行有一位年轻雇员，经常从巴塞尔来到这里，向侨居日内瓦的那些讨人喜欢的美国小姐中的一位大献殷勤。

1932年2月大学毕业后,我有过完全失业的深切经历,但为时只有八到十个星期。又是借助亲友关系,我成为全国经济联盟的一名职员(我已以优异成绩取得学士学位,并是费·贝特·卡帕学会^①的一个成员),作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我现在感到说出来有些惭愧的是,全国经济联盟是由阿奇博尔德·罗斯福和其他保守分子创建的一个压力集团,它坚持主张平衡国家预算。1932年7月,又是通过亲友介绍,我成为约翰逊和希金斯海上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一名小职员。在该公司任职的第二年里,有两件难忘的小事情,一是甲级邮件的寄费从二美分增为三美分,使这家企业把它在曼哈顿商业区的邮递事项不再交美国邮政局而改为自行办理(这是我第一次并且是痛苦地熟悉一种富于弹性的需求表格);另一件是经理部给我的一张纸条写道,由于全国复兴署的原因(我能够从它的字里行间领会到“没有其他原因”这句话),我的薪水将从每周十二美元增为十五美元。

1933年2月我已准备好将在当年秋天作为经济学研究生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作为入门课程,我选读了《纽约晚邮报》金融编辑拉尔夫·W·罗比在夜校开设的货币与银行课程。在1933年2月和3月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他让全班学生阅读美国银行体系破产的逐日报道,这就使得经济学也象《波林历险记》那样激动人心。

经过一些难以描述的智力上的准备,我在1933—1934

① 成绩优秀的美国大学生及毕业生所组成的荣誉学会。——译者

年度秋季的国际银行学课程的一篇学期论文中，碰巧选中一个题目：丹麦与新西兰之间的竞争性外汇贬值。本杰明·H·贝克哈特教授鼓励我把它修改发表，关于这件事以及我在专业方面的人事关系，可参见第八章。我在早年反对有伸缩性的汇率的偏见迄今依然如故。

1936年6月，我完成学习课程并着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后，就到美国财政部国际研究司，在哈里·D·怀特和弗兰克·V·科伊手下工作，工作内容是计算各种货币、特别是金集团国家货币的购买力平价。这是一个临时性的职位；1936年10月1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我提供了一个长期职位。这两个职位的月薪都是二百美元或年薪二千四百美元。怀特先生问我是否考虑留在财政部，我说假如给我专业人员级别（这种级别共分六级）的第二级待遇，即年薪二千六百美元，我将考虑留下来。他认为要求过分，我于1936年10月1日转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其时正是9月26日三国货币协定签订之后四天。

我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事欧洲经济事态和纽约外汇市场的分析，工作期间经历过1937年4月的黄金稀缺和当年秋天的美元稀缺。1939年2月，在希特勒进军布拉格之前，我同意于夏天到国际清算银行工作。在联邦储备理事会的一些朋友帮助下，我在1940年6月巴黎陷落后被召回美国。

我对这一切感到的兴趣远远超过读者，它说明我就是从这儿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也说明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是在探究已消逝的年代。本书不仅反映了我青年时期的经历所

形成的一些偏见，更多地反映了我在战后多年从事教学工作中所发展起来的学术上的特点。我要预先提醒读者注意防备这两方面引起的曲解。

由于受托论述的范围是三十年代，本书涉及的就是处于萧条中的世界经济。它不可避免地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出发，但还是尽可能地利用了来自欧洲的材料。编者会因为没有更多的关于苏联和亚洲的内容而不大愉快。关于这些方面的报道是被歪曲了的，但一个人对自己不懂的东西不应该装懂。

我也意识到本书很少涉及这次萧条中普遍而大量存在的有关社会、政治和个人的戏剧性事件，这些事件在斯图德·特尔凯尔、约翰·布鲁克斯和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已经有所论述。我在对一本用经济计量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史著作的评论中曾经谈到，我没有发现跟棉花打交道的人们的辛劳，也未听到船员们起锚的号子声音。除了上述自传体的评述以外，本书也未叙述有关证券经纪人或苹果售卖人的有声有色的趣闻轶事。本书也没有运用新型经济史著作所采用的经济计量方法，这种经济史著作力图用时间滞后变量的多元回归来严格证明某些假说。本书是用叙述方法谈历史，而不是用平方差表格、杜宾—沃森检验准则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来解释历史。对本书来说这些东西就更不合适了。

最后，要解释一下，我在自己所专攻的国际金融机制这一领域中，找到了关于萧条为什么如此广泛、深刻和持久的答案。这不应使任何人感到惊奇。

作为并非专攻历史学的人，我对历史学专家和那些象我一样处于其边缘的人，深为感激。历史学界对于行外人的殷勤好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惠赐助力而不是防范自守。首先，我得向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 D·E·莫格里奇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我的同事彼得·特明致谢，他们两位仔细校阅了原稿，并根据各自的专门知识提供了改进意见。特明提出了有关论据和论证方面的大量值得探索的问题。莫格里奇做了超出他职责范围的事情，提请我注意其它的证据，对一些论证提出质疑，特别是从一些公共档案中发掘出一些材料，为许多论据不足的论点提供了补充材料。

在给我教益的人们中，除了应该首先提到莫格里奇和特明两位以外，其他的人，我将按字母顺序提出，以免作出令人不快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区别。普林斯顿大学和亚特兰大大学的莱斯特·V·钱德勒教授提供了他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档案里摘抄的大量材料供我分析参考，并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意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斯蒂芬·V·克拉克校阅了原稿，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评论，而且还为弄清几个论点仔细查阅了银行的档案。康奈尔大学海伍德·弗莱西格教授，也在从事萧条问题的研究，他让我拜读了他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和另一篇重要论文的草稿，还改正了我原稿中一个重要错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乔治·加维促使我注意到沃廷斯基于1931年和1932年倡议在德国实行公共工程的著作，并在我买到格罗特科普所著《大危机》一书以前，把该行的这本藏书借给我使用。

与这个主题紧密相关，哈佛大学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教授坚持威廉·劳滕巴赫（1930年和1931年德国经济部的一个高级顾问）关于实行扩张性政策的意见的重要性。

目前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任职的海伦·休斯博士把她尚未发表的关于澳大利亚经济史中的两章草稿借给我。小宫隆太郎教授应我的请求，力图从日本的材料中找出下述问题的答案：即早在1932年，日本在没有一个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情况下，是怎样产生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威斯康星大学彼得·H·林德特教授对本书初稿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意见。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研究生詹姆斯·R·摩尔写了一篇关于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的博士论文，他好意地给我一份有关资料的文献目录，这是请教过一些名副其实的的历史学家的。伊利诺伊大学亚历山大·斯特姆撒尔教授给我提供了关于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外汇贬值表示反感的引人注目的材料。

一本这类性质的书的著述过程，还包括我在一些大学和学术团体的讨论会和讲演中所提出的各种想法。这些单位有：亚拉巴马大学，剑桥经济史研究小组，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以上单位，我是作为对外关系研究会讨论班的成员参加的），此外还有康涅狄格州萨利斯伯里的国际事务学会（前身是1931年国际学生联盟）和纽约大都会经济学家小组。在上述场合所进行的交流和讨论（上面提到的有些学者也曾参加），都是很有促进作用和启发作用的。

哈佛大学给住在邻近地区的学者提供了优惠的措施。

允许他们每年有一个月时间免费进入藏书极为丰富的怀德纳图书馆。我曾经两度享用这个值得珍视的优惠，谨此向该大学和图书馆致谢。然而，即使我有时利用过这幢耸立街头的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并不意味着我无需对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杜威图书馆表示衷心的感谢，它的友好和热情的帮助几乎补足了我搜集资料过程中留下的空白，而且我在这里还要向巴巴拉·克林根哈根、威廉·普雷森和其他人致谢。

现在已是贝利夫人的玛丽·安·里尔登，1970年初夏帮助我从大量统计资料中搜集了远远超过我所能利用的资料。安妮·波普对于本书初稿的全部整理工作和大部分打字工作作了重要贡献。最后的定稿是由现已退休的伊内兹·克兰多尔夫人打出来的，她象克林根哈根女士和我一样，也是一位年迈的人，她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担任系秘书约二十年之久。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父亲E·克罗斯比·金德尔伯格，他曾以极大毅力同病痛斗争，也同大萧条斗争。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

马萨诸塞理工学院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恢复过来	16
第三章 经济高涨	48
第四章 农业的萧条	79
第五章 1929年证券市场的崩溃	110
第六章 滑向深渊	141
第七章 1931年	164
第八章 更剧烈的紧缩	195
第九章 世界经济会议	230
第十章 复苏的开始	273
第十一章 金集团的屈服	292
第十二章 1937年的衰退	311
第十三章 在分崩离析的世界经济中重整军备	331
第十四章 对1929年萧条的一种解释	347

第 一 章

导 论

1929年的世界萧条在经济分析和历史学方法论方面引起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保罗·萨缪尔森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1969年一次电视辩论中抛出来的不同观点里，也许可以得到最简要的概括。正如弗里德曼在其它一般场合和专门论著中所做的那样，^①他断言，萧条的原因只有一个：美国采取了错误的货币政策。而萨缪尔森则坚持认为，那只是历史上的一系列偶然事件造成的。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就会排除一系列次要的分析性的问题，而只要确认萧条的根源主要在于经济体系而非偶然事件，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在他看来，萧条的起源地在美国而不在欧洲或其它地区；是货币因素而不是实物因素；在于政策而不在于制度的性质或需要制度完成的任务；是一个国

^① 例如，参见《国际收支：自由汇率对固定汇率》（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华盛顿，1967年），第90页：“当美国从事通货紧缩，着手减少货币存量的时候，世界其余部分陷入了大灾难。”弗里德曼论述这个主题的学术性著作，见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特别是第7章，《大紧缩，1929—1933年》。它也于196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以《大紧缩》为书名单独印行。